

doi:10.20270/j.cnki.1674-117X.2025.1010

中国当代生态文学对科技至上现象的书写与反思

龙其林, 纪梦琦

(上海交通大学 人文学院, 上海 200240)

摘要: 中国当代生态文学通过对科技至上给全球生态环境造成负面影响的书写, 使科学技术的双面性与伦理问题得以呈现, 丰富了中国当代生态文学的表现范畴。中国当代生态作家不仅聚焦科技至上带来的全球性现实生态问题, 而且还关注科技至上对人类思想观念的危害与束缚, 并对科技至上现象进行了深刻的文化反思。

关键词: 生态文学; 生态危机; 科技至上; 文化反思

中图分类号: I207.4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25)01-0090-06

Writing and Reflection on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upremacy in Contemporary Ecological Literature in China

LONG Qilin, JI Mengqi

(School of Humanities,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0, China)

Abstract: Contemporary ecological literature in China enriches the scope of expression by portraying the negative impact of technology supremacy on the glob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highlighting the dual natur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ethical issues. Contemporary Chinese ecological writers not only focus on the global ecological problems brought about by the supremacy of technology, but also pay attention to the harm and constraints of technology supremacy on human ideological concepts, and have conducted profound cultural reflections on such phenomena.

Keywords: ecological literature; ecological crisi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upremacy; cultural reflection

人类从匍匐于自然脚下的奴隶到成为统治地球的主人, 时间不过 200 多年, 造成这一转变的重要原因在于科技理性的形成。所谓科技理性, 就是人们在科学技术活动中体现出来的思维方式。“生态危机与科技的异化具有一定的因果关系, 科技运用过程中带来的危机, 实质是物的进步抑

制人自身进化, 甚至导致人的异化, 因此, 也可以说是人的危机。”^[1]从某种意义上看, 人类对科技的依赖与滥用, 加快了生态危机到来的速度, 使得人类社会对自然界的索取和破坏变得更加贪婪。可以说, 人类对物欲的不断追逐, 加快了自然生态问题的爆发时间。尽管将人类的科技发明

收稿日期: 2024-10-19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全球化与中国当代生态文学书写研究”(22FZW084); 广州大学重大科研项目“中国当代生态文学史稿”(YM2020009)

作者简介: 龙其林, 男, 湖南祁东人,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博士, 博士生导师, 博士后合作导师, 研究方向为中国当代生态文学。

视为全球生态危机的罪魁祸首是偏激的看法,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科技发明在造成人类生态危机过程中所起到的负面作用。兴起于 20 世纪 80 年代的中国当代生态文学,对于科技至上与环境破坏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长期书写,其中的佼佼者如徐刚的《终极孤独》,李存葆的《鲸殇》,侯良学的《圆桌舞台》,李良、李正义的《越界的公害》,杨文丰的《病盆景》,戴战军、徐永青的《拯救与命运》,王英琦的《愿环球无恙》等作品,更是因其对全球生态危机的文化反思,给读者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一、科技至上引发生态灾难的书写

科学技术激发了人类探索自然的能力,自然的种种神秘性因其被不断揭示出来。自然的神秘性一旦消解之后,自然环境在科技工作者和企业生产者眼中也就成了可以开发的生产资料的天然储存场。为了追逐源源不断的利润,自然似乎成了人类最无私的“馈赠者”,可以说,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的工业化起步阶段都是以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为序幕的。余谋昌认为,现代科学技术在被人类用来认识、发现自然规律的同时,也可能成为人类为了一己之利而改造、破坏自然的工具:“现代科学技术发展中,人的利益是唯一的目标。它以人统治自然为指导思想,以人类中心主义为价值方向,科学的合理性被定义为努力统治自然。”^[2]

关于科技的进步,徐刚在《终极孤独》中有过一番深刻的表述:“所有的技术进步都是暂时的,而由此带来的衰退及混乱都是持续的,乃至无法挽回的。自 20 世纪开始以来,全世界已有 75% 的农作物品种绝迹。在欧洲,1900 年存在的家畜家禽中,半数已经绝种。这种情况恰恰是现代技术进步的副产品:农场主、农民为了追求最高的效益和产量,总是喜欢把资金、人力用在效益最高的品种上,其余的物种就只能被遗弃。”^{[3]164-165} 在徐刚看来,科技进步带给人类的实惠只是表面现象,其背后是极为严重的生态破坏:“新的优良品种的作物已经大规模地取代了传统的和野生的作物,到 1990 年绿色革命第 4 个 10 年时,新品种作物已经覆盖了全世界 1/2 的麦地和稻田。”^{[3]166} 为了获取机器运转所需的润滑剂,动物成了人类猎杀的对象。李存葆的《鲸殇》深刻揭露了人类为科

技术发展而施虐于鲸鱼的残酷事实:“人类施虐于鲸,盖源于鲸的通体是宝。鲸的皮下脂肪甚厚,出油率极高。一头蓝鲸可炼油三十吨,相当于二千只胖猪或八千只肥羊。鲸油是近代油脂、化学工业的重要原料。由鲸头部提取的油,则是精密仪器、运载火箭、宇宙飞船的高级润滑剂。”^[4] 人类通过猎杀动物获取润滑油剂,其目的是使机器在开发自然的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海洋占地球表面面积的 71%,地球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名副其实的水球。正是因为地球上海洋占了绝大部分面积,所以其就成了人类存放各大洲排放的污水废水、倒放有毒有害物质的大水池。尽管海洋具有强大的自洁能力,但是当人类排放的有毒有害物质改变了海洋原有的状态之后,海洋的生态系统必然遭受破坏,导致海洋污染的发生。在人类进入工业文明之前,人类社会对于海洋的污染非常有限,也不足以对海洋生态系统构成威胁,但是当人类科技能力有了巨大飞跃、工业文明不断发展之后,人类对自然界的损害就明显加剧了。当工业生产中和生产后排放的有毒有害物质进入海洋环境后,原有的海洋生物就面临着生存环境的破坏。废水、毒水的流入,导致海水质量下降,使得海洋动物的生存及繁衍、物种平衡等出现异常的变动,海洋环境因此不断恶化。如果海洋污染持续时间长,那么鱼类身上的毒素会通过食物链最终进入人类身体,从而导致工业污染从海洋迁移至人类社会。侯良学在生态诗剧《圆桌舞台》中,通过诗人阿红之口揭示了人类凭借科技对海洋的肆意污染与破坏:“你一定读过安徒生的《海的女儿》/那美丽善良的美人鱼姑娘/演绎了一场怎样感人魂魄的/千古绝唱的爱情……今天我们长大了我们不再相信/因为我们的科技已经足够发达/我们可以透过高科技摄影机/拍摄海洋版的悲剧《哈姆雷特》。”^[5] 海洋是地球生命的孕育地,但人类进入工业文明时代后却不断破坏自己的生命起源地,曾经伴随人类成长的童话、传说也在冰冷的科技面前彻底消解了。

在一些乐观主义者看来,人类已经走上了探索太空未知文明的道路,科学技术必将解决人类面临的大部分问题。但实际情况却是,科学技术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不仅没有将人类带出银河系的理论可能性,其也无法为人类找寻另外一个可以

生存、繁衍的行星作为殖民地。不但如此,科学技术还加快了地球生态系统的崩溃,使得局部地区或领域的生态失衡问题变得更加尖锐,使得动物灭绝、空气污染、臭氧空洞、南北极冰川融化等情况变得日益严峻。李良、李正义在《越界的公害》中对于科学技术导致的全球性生态环境破坏现象有着触目惊心的描述:“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解放出了巨大的生产力,虽然给世界带来了空前的繁荣和生机,但随之也带来了战争、核威胁、资源危机和环境污染。……为争夺资源、争夺土地而进行的战争从来就没有在这个星球上平息过。”^[6]事实上,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人类对科技理性的痴迷也似乎较之以往更加严重。

新技术革命被一些专家、学者视为潘多拉盒子,认为其一旦打开之后,将使人类在开发与征服自然的过程中难以回头。在古希腊神话中,提坦神的儿子普罗米修斯从天上盗火种送给人类。人类学会使用火之后,最高统治神宙斯十分恼火。为了抵消火给人类带来的巨大好处,宙斯决定让灾难降临人间。科技理性在使得人类掌握征服、控制、掠夺自然能力的同时,也让人性中的贪婪、残忍、不负责任等恶的属性得到了释放的机会,使其不断地利用科学技术对自然界的山川河流、动物植物进行劫掠。1968年4月,一个研究全球问题的国际性民间学术团体罗马俱乐部在意大利首都罗马成立。“罗马俱乐部提出的第一份关于全球问题和人类困境的报告,对西方文明的挑战是猝不及防的——新技术革命的潘多拉盒子打开后的失去控制;人类在对自然界的开发与征服的同时,正在侵犯自己的生存基地,并且在掠夺子孙;人类借以生存的整个生物圈正在缩小,自然灾害将会空前地增多并趋向恶性;现代人和未来人的生存空间将被沙漠捷足先登……”^[7]人类在科学技术的加持下,放纵了自身对物质生产和利润的追逐,其在实现利益最大化的目标指引下,大肆攫取自然资源作为生产原材料。这个过程,同时也是对生物圈中其他生命生存资源进行掠夺的过程,也是对原本平衡的自然生态进行破坏的过程。

在中国社会步入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科学技术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科技革新提高了社会生产力,加快了现代化进程。中国作家也在中国社会的现代化繁华景象下,敏锐地发现了科

技至上观念对生态环境产生的巨大影响。他们秉笔直书,对科技至上惯性带来的生态破坏作用进行聚焦,引发了人们的深刻反思。

二、科技理性催生环境问题的聚焦

科技理性之所以令人不寒而栗,不仅在于它直接作用于自然生态,从长远来看将导致生命生存环境的巨大破坏,而且其彻底消解了人类对于自然的敬畏,使得没有了约束之后的人类在征服自然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詹克明在《敬畏自然》中,对于科技理性的危害有过深刻阐述:“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特别是它最近400年的突飞猛进,在一般人们的心目中大自然似乎已一览无余不再神秘。人们不再敬畏自然,凭借手中的科学技术,改变环境,创造出数不胜数的人工制品,过上了越来越舒适的生活。人们渐生狂妄,乃至发展到‘人类至上’的程度,活像普希金笔下的那个渔妇。解除了敬畏之心束缚的人类,总是为着各自的私利由着性子胡来。”^{[8]⁴⁶⁴}在科技理性至上的年代,人类对于自然环境的破坏无处不在,但要让人类长久地存在于地球之上,饮鸩止渴的行为显然并不理智:“人类在发展中堕落,在科学中愚昧,在叛逆自然中自掘坟墓。忤逆自然的人类将不会在大自然里寿终正寝。人类是一个整体,我们都是‘地球号’宇宙航船的乘客。”^{[8]⁴⁶⁵}将地球视为宇宙航船,而人类只是其中的乘客,这样一来,地球作为人类生存的栖息地的整体形象就呼之欲出了。

在中国当代生态文学中,不少作家在全球视野下进行生态现象的描写时,常常将科技理性作为批判和反思的对象。面对科技不断发展的状态,人类似乎越来越陷入难以自拔的境地。人类科技创新的速度越来越快的同时,全球生态系统被破坏的范围也越来越大、程度也越来越深,二者构成了一种内在的因果关系。华海在诗歌《悬崖上的红灯》中以“钢铁的车”隐喻人类在科技的武装下碾压自然万物的事实:“一盏风中的灯 愤怒的灯/呼叫的灯/一盏灯的呼叫/并不能让‘欲望号’快车停下/钢铁的车 惯性的车/朝着那既定的完美方向/一路狂奔 辗过所有的/星光和青草/辗过夜鸟的惶恐/山峰的沉默 甚至辗过从来没有恩怨的/那些无辜昆虫。”^[9]在诗歌《望星空——答郭小川》

中, 侯良学仿照郭小川的名作《望星空》, 将人类在科技裹挟下企图探索其它星球、征服太空, 结果却导致太空环境污染的场景进行了令人惊悚的描写: “一次又一次我抬头仰望布满星星的夜空, 我渴望看见 / 一个跟我一样的面孔, 在一颗与地球一样的星球 / 上……没有发现一个星球 / 跟地球一样可以让人类移居可以让万物生长, 没 / 有水没有空气没有森林, 怎么能够充作人类的 / 家乡? / 多么痴心妄想, 要让满天星斗, 全成为人类的家乡?”^{[10]84}

从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人类对于科技理性有了更为全面的理解, 对于其中凭借科学技术凌驾于自然之上、损坏地球生态平衡的种种弊端有了深刻的反思。作家杨文丰从盆景的变异过程中看到了技术主义的可疑面貌: “从树上爬下来直立行走后, 这‘人’, 就在天天骄傲于‘智慧’的同时, 也日日迷误于‘智慧’了。‘聪明反被聪明误。’果然是, 人掌控的技术愈多, 就愈迷幻入技术主义的阴云, 愈陷落于自己制造的病灶; 表面上看是披着五彩朝曦在昂首阔步地进步, 而从本质上看却是在一步步滑入落日的余光。”^{[11]9}所谓技术主义, 其实就是对于科技的迷信与偏执。可怕的是, 从 19 世纪中期以来, 人类就习惯了科技进步带来的成就感与幻觉感, 将自然的退却当作理所当然的进步。在诗歌《集体失眠》中, 侯良学对科技负面作用进行了更深入的揭示: “失眠的长途旅程 / 骤然响起警报—— / 救护车上闪烁的光——警车顶上的闪烁的光—— / 消防车的喇叭——火车的汽笛—— / 轮船的汽笛——宇宙飞船的长长的尾巴—— / 子弹的呼啸——原子弹和氢弹的蘑菇—— / 集体失眠的高度发达的现代文明万岁万岁万万岁。”^{[10]146}的确, 从局部看, 人类运用科技手段改善了全球生态环境, 如防止沙漠蔓延、净化江河水质、控制悬浮有害颗粒等等, 但这并未从根本上遏制全球化生态危机程度的加剧。

在日常生活中, 人类除了有物质消费的追求外, 还有安全的需求、审美的需求, 但是科技理性却彻底瓦解了长久以来驻留在人们心目中对于自然神秘性的向往, 以冷冰冰的现实昭示着人类童年时代的消逝: “科技, 似乎在毫不留情地打乱人月关系的方寸了! 依靠如此伟大的科学技术, 人类将千万年遮掩明月的神秘及美丽的面纱扯去了, 彻底扯去了, 无情地扯去了! ……人类成了

美妙神话的掘墓人, 美月丧生的刽子手, 与自己角力的大敌, 以‘科技真’取代‘情感真’的聪明动物! 科技, 成了大煞风景的手!”^{[11]211-212}美丽与科技似乎是一对难以相容的对立物, 拥抱美丽往往意味着一种虚幻的理想, 在科技的审视下, 美丽消退为坚硬的物质存在。人类在科技理性的加持下, 自以为可以掌握世界, 却忘记了一个更伟大的造物主在背后默默地注视着一切。科技理性的存在, 无情地撕碎了人类对于自然世界美好形象的憧憬。人类登月的过程, 既显示了科技的力量, 同时又暴露出科技对美丽的消解和毁灭。在科技理性面前, 自然界卸下了神秘面纱, 客观世界成为人类探索与征服的对象, 成为可以被加以利用、制造利润的原材料。人类历史上一直幻想着的月亮上的波浪荡漾的海洋, 最后却被科学发现其不过是多达 100 亿吨的水冰, 即作家所言的“绝望的死水”。月亮失却了童话与传说的美丽身影, 科技理性呈现给人类的月亮表面是一幅冰冷、死寂的画面。

进入近代社会以来, 科技理性在给人类带来科技巨大进步的同时, 也导致了人们对科技理性的盲目崇拜。中国当代生态作家注意到了科技理性与生态破坏之间存在的内在因果关系, 他们通过日常生活中的具体案例, 揭示出: 人们在科技理性推动下, 忽视了生态环境的有限性与科技理性的反噬作用, 而一味追求科技带来的物质享受, 从而导致了人类面临着更为复杂的生态压力。

三、科技至上现象背后的文化反思

科技至上主义支持者的核心观念在于, 科学技术能直接影响甚至决定人类社会的发展, 科学技术具有自身的独立性, 因此, 只要它一直在发展, 人类社会的许多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事实上, 科学技术的发展的确在很大程度上加快了人类社会的发展速度, 重大的科技发明经常能在短时间内改变人类的生活环境与认知状态, 医疗、化学、生物、建筑、电力、机械等领域的科技进步, 更是对社会发展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近代以来, 不少思想家对科学技术的进步及其社会价值持有非常乐观的态度, 把科技看作为人类带来幸福、消除苦难的终极工具。进入 20 世纪后, 人类先后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 在日本广岛、长崎爆炸的

原子弹,标志着人类科技的发展已进入足以毁灭自身的年代,科学技术的负面影响开始引发有识之士的忧虑。

随着全球性生态危机的到来,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将人类发展、繁荣的希望寄托在单纯的科学技术的进步上隐藏着巨大的危机。科技至上的观念强调科学技术的决定性作用,但忽视了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幸福有赖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事实证明,科学技术如果使用不当,完全会造成对人类幸福的反噬作用。在散文《心月何处寻》中,作家如此追问科技至上观念主导下的人类登月行为:“人类何以要登月?仅仅是为了探秘?只是为了证明人类不是芦苇,不但不脆弱,反而是非常坚挺、伟大?只是为了张扬与大自然争霸的雄心?是企图逐步占领月球?是强国间的争霸——是为了求证科技远比旧月亮更有神话色彩?是为了宣扬‘科技主义’或‘工具理性’能使自然异化,使月亮异化?人类又何以就能够登月?”^{[11][213]}作家在这里探讨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即自然的异化与月亮的异化问题。从异化的视野来看,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生产过程和劳动者都被异化了,人的本质与人们之间的关系也同样如此。这里,作家借用异化的概念,表达了其对偏离人类生存与发展价值的科技至上观念的忧思。人类发明、利用科学技术的最初目的,是为了让科技成为人类探索自然、维持生产的工具,是为了让人类在自然界张扬主体性,帮助人类实现与自然的平衡状态,但随着科技的发展,人类却似乎越来越凌驾于自然之上,俨然成了主宰自然命运的新神。

从培根的“知识即力量”开始,到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这些肯定知识和理性的思想,为科技至上观念的兴起奠定了思想条件。尤其是进入20世纪之后,人类不再将自己视为自然的衍生物,而希望自己成为自然的主宰。王英琦在散文《愿环球无恙》中这么分析:“人不再是自然的一部分或自然的派生物,而是‘自然为人生成’,以自我衡量自然征服自然的独立主体了。‘人类理性要为自然立法’了。人果然在人类中心说和科技宗教的双重激励下,向大自然盲目远征了。”^{[12][6]}但当人类掌握的科学技术不断丰富之后,世界却并没有朝着更加和谐、美好的方向发展,从生态学视野来看,世界反而陷入了更加混乱的状态。

地球的生态环境遭到持续破坏,各种致命武器对地球的全体生物构成了巨大威胁,不断兴建的钢铁都市吞噬着大地上的自然空间,人类在名为城市的空间里大量制造各类垃圾与污物。王英琦说:

“人类有了现代科技和现代工业,亦同时有了年均1000立方公里的污水排放量;人类有了高消费的生活和享受,也同时有了数亿吨冲破臭氧层的超光化学烟云;人类有了核武器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更同时有了将这些超核武器加在一起,把人类消灭60次还用不完的自我毁灭能力;人类建造了成千上万个摩登都市和摩天大厦,人类家园因此也失去了绿色植被田园风光,物化成了一片钢筋混凝土合成的‘人造天地’。”^{[12][6]}人类自诩为天地万物之精灵,但常常在利益与欲望的诱使下,倾向于选择自我毁灭的生存方式。如今,人类已经进入了21世纪20年代。这个时代看似科技高度发达,但人类的思想、道德、认识水平似乎并未得到实质性的提高,那些在局部战争中失利的极权统治者,甚至还不时发出核毁灭的威胁。当下,信息技术飞速发展,太空探索也进行得如火如荼,但在全球性的生存与生态问题上,世界各国却至今没有达成共识。生存还是毁灭,至今还是困扰人类的难题。

科技至上观念经常被人和人类中心主义思想一起加以讨论,原因在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强化了人类中心主义。人类在科技力量的加持下提高了征服自然的能力,自然界似乎越来越成为人类活动的跑马地;相应地,人类中心主义在科学技术的推动下得到进一步巩固,人类越来越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视为地球范围内的最高目标。在这种相互促进的作用下,科技至上和人类中心主义结合得日益紧密。当代人在处理人与自然的价值关系时,往往将人类作为唯一的主体,而自然则彻底沦为人类生存的客体和背景;科学技术的发展验证和巩固了人类的自我中心立场,人类将自身视为一切活动的目的。当代流行的科技至上观念和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引发了中国当代生态作家的深刻反思。在生态报告文学《拯救与命运》中,戴战军、徐永青从歌德塑造的浮士德形象中看到了现代科学技术中隐藏的人类中心主义色彩,认为这是欧洲长期以来人与自然对立观念的延伸:

“欧洲是现代科学技术文明的发祥地,凝结着西

方价值观念的思想传统。这之中不乏唯上帝是从的宿命主义和悲观主义, 然而更具影响的却是那种‘浮士德式’的对于大自然的挑战和对生命意义的积极探索。……这种‘浮士德式’的战斗精神, 是西方生产力特别是科技水平发展、提高的产物, 也是由此而来的那种‘人主宰自然’的文化传统的反映, 是人类由畏惧自然到战胜自然的进步标志。”^{[13]246} 作为校正, 作家提出以中国文化传统的“天人合一”哲学观调和西方的人类中心主义观念, 以便科技理性在面对自然环境时收敛其飞扬跋扈的姿态: “显而易见, 在西方传统中以人为万物中心、人与自然矛盾对立的思想, 与在中国占主导地位的‘天人合一’的传统哲学, 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因此, 西方学者中尽管有人赞美保护自然的原则自古以来是中国的文化财富, 但许多人却从这种对比中, 批评中国文化传统缺少创造与抗争精神。”^{[13]246} 姑且不论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天人合一”哲学是否能够从根本上解决人类中心主义、科技理性带来的精神焦虑问题, 但至少它让人类意识到, 长期以来人们习以为常的那种科技进步就意味着进步与幸福的理念存在明显的缺陷, 人们应该尝试从包括中国文化传统在内的不同文化系统中寻求精神救赎之道。

在科学技术的发展历程中, 人们曾一度忽略其与伦理道德之间的关系。20世纪以来, 科学技术突飞猛进, 科技至上带来的不良后果逐渐浮现, 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的关系这才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现代社会的人们越来越意识到, 科学技术活动与自然、社会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系, 人类在从事科技创造过程中需要遵守一些必要的价值观念、行为规范, 调整好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地球等事物之间的关系。杨文丰倡导, 通过“科技伦理”约束“科技理性”, 使科学技术不至于在损坏地球生态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而没有科技伦理, 你敢断言这科技, 浑身上下冒出的全是促使人类进步的力量吗? ……宗教上的神失却与否在今天已不再重要, 重要的是人类心中业已在供奉一尊至高无上而又特殊的大神——‘科技神’! 而且正越供越高, 越供越大。”^{[11]214} 在科技高度发达的时代, 神话传说与宗教信仰都逐渐丧失了其生存、发展的土壤, 在

科技神面前显得不堪一击, 但事实证明, 物质主义的科技理性并不能满足人类多种多样的精神需求, 追求物质与欲望的道路非但没有使人类获得精神的栖息地, 反而使其愈加陷入追逐欲望的焦虑与失望状态。

现代化进程推动了生态文学现象的形成, 中国当代生态文学对科技理性带来的生态环境症候进行了大量书写, 其反映出民众对现代科技条件下人与自然关系的忧虑。严酷的事实证明, 科学技术本身并不具备终极价值, 它们只是人类认识和探索世界的工具。全球性生态环境的持续恶化状况不断地昭示着人类, 必须废止对科技理性的盲目崇拜, 必须停止对自然环境无休止的开发和破坏, 必须把守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当作人类永恒的使命。

参考文献:

- [1] 张劲松. 生态治理的科技理性批判[J]. 国外社会科学, 2012(6): 115.
- [2] 余谋昌. 生态哲学[M]. 西安: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0: 126.
- [3] 徐刚. 我将飘逝[M].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5.
- [4] 李存葆. 绿色天书[M]. 郑州: 河南文艺出版社, 2006: 16.
- [5] 侯良学. 圆桌舞台[M]. 太原: 三晋出版社, 2011: 28.
- [6] 李良, 李正义. 越界的公害[M]//许正隆. 水啊! 水. 北京: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1999: 235-236.
- [7] 徐刚. 伐木者, 醒来![M].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7: 2.
- [8] 詹克明. 敬畏自然[M]//许正隆. 人类, 你别毁灭自我. 北京: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1997.
- [9] 华海. 华海生态诗抄[M]. 北京: 大众文艺出版社, 2006: 46-47.
- [10] 侯良学. 让太阳成为太阳: 侯良学生态诗稿[M]. 太原: 三晋出版社, 2010.
- [11] 杨文丰. 病盆景: 自然伦理与文学情怀[M]. 北京: 西苑出版社, 2017.
- [12] 王英琦. 愿环球无恙[M]//张力军. 愿地球无恙. 北京: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1997.
- [13] 戴战军, 徐永青. 拯救与命运[M].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92.

责任编辑: 黄声波